

· 历 史 ·

## 十月革命前俄罗斯远东地区华人商业活动

潘晓伟

(黑龙江大学 黑龙江流域文明研究中心 哈尔滨 150080)

**摘 要:** 十月革命前商业是华人在俄远东地区较为集中的领域,从业人员多、活动范围广。华商的足迹不仅限于人口较为密集的城市,在较为偏远的土著居民区也能看到。华人在远东的商业活动呈现出以下特点:中小商人数量多,大商人数量少;在同俄国商人的竞争中具有一定优势,如经营成本低、员工参与分红等;华人商业活动受东北亚局势特别是中俄关系影响大,在中俄关系紧张时远东华商数量减少。华人的商业活动活跃了远东的商品市场,丰富了远东居民的生活,这对于居住在偏远地区居民尤为明显。

**关键词:** 华人; 商业; 俄远东地区

中图分类号: K512.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0961(2017)05-0071-06

近几年,包括华人史在内的海外华侨华人问题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然而相较于东南亚、北美地区华侨华人的研究,我国学界对俄罗斯华人的研究显得薄弱。这一状况与华人在俄罗斯的悠久历史及在各个行业扮演的角色是不相称的。由于地缘的原因,俄远东是近代华人最早进入和长期生活的地区,十月革命前远东各个领域都留下了华人身影,其中商业是华人较为集中的一个领域。该问题虽已经受到我国学者关注<sup>[1]</sup>,但鉴于侧重点不同,未能对十月革命前华人在俄远东的商业活动进行全面研究,该问题仍有继续探讨的必要。

### 一、远东华商的数量及经营情况

十月革命前,俄远东地区华人所从事的各类职业中,商业的从业者比例是很高的,这能从时人,既有俄国人,也有中国人,对华人在远东经商活动的描述中反映出来。例如,19世纪末曾任滨海省驻军司令的 П. Ф. 翁特尔别格描述:没有任何一个买卖行业里,我们会看不到中国人,从中国

人作为卖主的市场提供生活必需品——粮食、肉类、蔬菜开始,到小本生意,市场的货摊,以至于省内各主要中心城市,直至乡村的常设商店,到处都可以看到中国人……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中国商店,数量与年俱增,小本生意几乎完全由他们操纵,当地的大贸易商行也感到自己营业所蒙受的损失在日益加重<sup>[2]190</sup>。

据1885年奉命密查俄界阿穆尔地区情形的清朝官员曹廷杰调查,仅伯力、红土岩、双城子、海参崴、彦楚河五处,就有中国人的“大小肆店三百余家,各立门市坐贾营生”<sup>[3]</sup>。

20世纪初,驻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中国领事官在发给外交部的文件中提及华商数量。1908年该地20万元以上资本华商有16家,2万元以上有百余家,千元、百元以上者四五百家<sup>[4]</sup>。

从业人员数量一定程度上能反映出该行业发展情况,同时一定数量的从业人员也是行业发展的一个必备条件。那时华商较为集中之地是滨海省,而阿穆尔省华商数量和规模不及滨海省(见表1)。

收稿日期: 2017-09-30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资助项目(14YJC770023); 黑龙江省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黑龙江大学专项项目(HDJDY201608)

作者简介: 潘晓伟(1978-),男,黑龙江富锦人,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博士,主要从事俄国东部地区历史和近代东北亚国际关系史研究。

• 71 •

表1 1897年、1909年、1910年滨海省和阿穆尔省华、俄商人数量(人)

地区 年份	滨海省						阿穆尔省					
	1897		1909		1910		1897		1909		1910	
国别	中国	俄国	中国	俄国	中国	俄国	中国	俄国	中国	俄国	中国	俄国
掮客(торговое посредничество)	145	72	31	134	110	502	3	18	-	17	-	34
一般贸易者	785	239	1650	787	1877	1264	703	421	321	718	340	881
粮食贸易者	18	9	14	92	20	118	2	13	-	63	-	61
其他农产品贸易者	1 051	409	347	146	431	176	50	213	-	59	-	65
建材和燃料贸易者	70	70	58	66	100	149	7	121	10	26	12	50
机器和工具贸易者	13	26	8	49	13	77	-	6	-	16	-	39
布匹和服装贸易者	243	48	334	334	449	429	65	75	-	94	30	25
皮革贸易者	28	9	-	18	-	10	-	8	-	10	-	-
零售贩卖者	483	37	-	1	-	-	192	35	1	96	56	98
客店、饭馆、酒肆经营者	731	322	155	459	210	376	54	196	19	116	29	119
总计	3 567	1 241	2 597	2 086	3 210	3 101	1 076	1 106	351	1 215	467	1 372

资料来源: В. В. Граве. Китайцы, корейцы и японцы в Приамурье. // Труды командированной по Высочайшему повелению Амурской экспедиции.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тип. В. Ф. Киршбаума, 1912. Выпск XI. "Приложение № 10" с. 363.

通过表1数据对比可以看出:第一,进入20世纪后阿穆尔省华商数量急剧下降,出现这种情况和海兰泡惨案、江东六十四屯惨案发生有直接关系。骇人听闻的屠杀让华人心有余悸,纷纷返回祖国。第二,1909年和1910年滨海省华商与1897年相比数量下降,这和1907年起俄国政府开始对远东工商业活动进行严格监管有关,华商的利润降低,许多华商返回祖国或另寻出路<sup>[5]</sup>。第三,俄商数量无论是在滨海省还是在阿穆尔省数量增长都比较快,这和俄国采取种种优惠政策吸引本国移民来远东地区有关,如1861年颁布的《俄国人和外国人向阿穆尔省和滨海省移民条例》,移居两地者可享受“免征兵役义务十次,并终身免交人头税”等优惠政策。

十月革命前,在远东经商的华人中有几位影响力较大,是华商的代表,他们是纪凤台、孙佐德、杜臣兴。

### 1. 纪凤台在远东的商业活动

纪凤台是山东黄县人,1872年从芝罘来到哈巴罗夫斯克务工,他和一般“候鸟”华人务工人员不同,他有理想,为此进入符拉迪沃斯托克商务专科学校学习。因通晓俄语,又具有一定经济头脑,他很快在远东众多华人中崭露头角。他曾在哈巴罗夫斯克一个工程队当过翻译,接触到一些俄国人,为他后来经商打下了人脉基础。1875年获得的二等商人证书,那时他已经拥有2万卢布的资本。1891年,纪凤台在哈巴罗夫斯克受到后来的沙皇、当时的皇储尼古拉的接见,皇储对其印象颇

佳,向其颁发了奖章<sup>[6]</sup>。1895年,纪凤台获得了华商几乎不可能获得的一等商人证书。1895年,纪凤台与俄国人合作开辟了哈巴罗夫斯克—松花江货运航线,并垄断了这条航线的粮食贸易。

19世纪末至日俄战争爆发前是纪凤台事业最好时期。1901年,成立了拥有20万卢布资产的纪凤台K商行,至1903年纪凤台K商行拥有5个子商行。纪凤台的经营领域已经超出了毛皮、纺织品、五金、日用百货等范围,相继成立了面粉厂、啤酒厂、砖厂、锯木厂和通心粉厂等,他的生意遍布俄国远东和中国东北<sup>[7]</sup>。

中日甲午战争后,东北亚地区列强角逐的主角是俄、日,已经加入俄国国籍的纪凤台卷入了俄日间角逐。日俄战争爆发后,纪凤台积极为俄国军队提供军需用品。为了保障俄军后勤供应,他组织起了几千匹骡子组成的驮运队和由1500辆大车、6000匹骡马牲畜组成的车辆运输队,其中2000头牲口是纪凤台提供的。日俄战争开始后,纪凤台在沈阳参与了警察队伍的组建。他作为一个熟悉中国东北风土人情的俄籍华人,在组织当地百姓为俄军服务方面,有着俄国人不可比拟的优势。纪凤台积极为俄军服务,这让日本人愤怒,为此日方要悬赏捉拿和击毙纪凤台。日本军方人士的话能折射出纪凤台在日俄战争中的表现,他说:抓住纪凤台就等于打赢这场仗<sup>[8]</sup>。俄国战败的结果让纪凤台多年积累的财富毁于一旦,他在中国东北的全部财产被没收。1910年纪凤台病逝,作为俄国最富传奇色彩的华商就此谢幕。

## 2. 孙佐德在远东的商业活动

十月革命前,有位叫孙佐德(Сунь Цзодэ)的哈巴罗夫斯克华商在当地颇有名气。1891年,孙佐德来到哈巴罗夫斯克。孙佐德工商活动的起点是向建筑工地供应建筑材料,从而获得了第一桶金。经过几年的发展,到一战爆发时他已拥有两个砖厂、一个石灰厂。除了搞实业外,他还从事木材贸易,资产一度达到5万卢布<sup>[9]412</sup>。1913年,孙佐德当选为哈巴罗夫斯克华人总会(Хабаровское китайское общество)会长。

尽管孙佐德是一个成功的商人,但他并非是一个遵纪守法的人,他曾参与黄金走私活动。孙佐德在哈巴罗夫斯克华人总会会长职位上的一些行为违背了总会的互助原则,总会变成了他个人敛财的机构。他曾向非法入境哈巴罗夫斯克的华人每人征收2~5卢布的费用,为华人小偷和红胡子“有偿”开脱<sup>[9]416</sup>。

## 3. 杜臣兴在远东的商业活动

杜臣兴(Тун Чансин)于1884年来到符拉迪沃斯托克,向驻军供应军需品是杜臣兴远东经济活动的起点,也是他在远东商业活动重要组成部分。杜臣兴最初供应对象是东西伯利亚第五边防营。1893年边防营换防后,杜臣兴和边防营一起搬至斯拉维扬卡,继续向边防营供应军需品。来到斯拉维扬卡后,杜没有放弃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事业,他既是第五边防营的供应商,同时也是驻扎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東西伯利亚第一工程营的供应商。1897年杜臣兴还短暂地向乌苏里工程部队供应过军需品。义和团运动期间及之后,远东华人大量回国,但杜臣兴选择继续留在远东。

杜臣兴是个精明的商人,当时军需品供应商炙手可热,中国人、俄国人都趋之若鹜,竞争很激烈,杜臣兴能同时作两支部队的军需供应商很难得。至于杜臣兴当时向驻军供应军需品的数量无确切记载,但从当时的记述能看出数量是很大的。符拉迪沃斯托克要塞军需处在1904年4月19日给相关部门公函中提及杜臣兴“符拉迪沃斯托克要塞军需处特许中国人杜臣兴有权利使用铁路,并保证畅通无阻地将5车厢食品运送至符拉迪沃斯托克。”<sup>[9]418</sup>

随着杜臣兴资本的增多,他不再满足于作军需品供应商的角色,在斯拉维扬卡成立了商行。

鉴于杜臣兴和第五边防营的良好合作关系,商行成立后,边防营关照其业务。1904年4月26日,第五边防营的叶泽尔斯基(Езерский)上尉发公函称:斯拉维扬卡边防营长官允准中国二等商人、承包商杜臣兴使用驳船从符拉迪沃斯托克向斯拉维扬卡运输一切商品<sup>[9]418</sup>。

华商除了在远东城镇广泛开展业务活动外,还将商业活动延伸至土著民族居住区,而且对当地贸易的垄断程度要强于其他地区。早在阿穆尔地区被俄国吞并前,汉族人就向这里的少数民族供应生活用品,1860年后这种关系没有因中俄《北京条约》的签订而发生改变。1860年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华商仍是当地土著居民生活日用品的主要供应者。商人和土著居民间的买卖是易货交易,通常是用生活用品交换毛皮。在阿穆尔沿岸地区刀兵河(р. Даубихэ)一带住着一位叫孙泰(Сун Тай)的华人,他主要向居住于刀兵河和松阿察河(р. Сунгача)一带那乃人(赫哲人)供应生活用品,并将收购的毛皮运到符拉迪沃斯托克和哈巴罗夫斯克出售。

华商和土著居民的商品交易是按照一定价格来交换的,不同的地区价格会有差异。1904年比金河(р. Бикин)一带的交易情况是:1普特黄米交换1/2~3张黑貂皮;1普特满洲茶交换6张黑貂皮;1普特盐交换3张黑貂皮;3俄丈平纹布交换1张黑貂皮;1把火绳枪交换6张黑貂皮;1把短枪交换6~8张黑貂皮;20发子弹交换1张黑貂皮。而1904年宏格力河(р. Хунгари)和奥托依河(р. Отой)一带及帝国湾一带的交易情况是:1张黑貂皮可以交换1袋55俄磅的美国面粉或30俄磅糖或8块茶砖,而土著居民要得到1俄磅火药需拿1/3~4张黑貂皮交换,要得到1俄磅铅弹则用1/8~1张黑貂皮交换<sup>[10]82</sup>。

后来俄国毛皮商人也来到土著民族居住区,俄国人和土著居民贸易随着展开。和华商不同,他们间的交易多用货币来支付,而非物物交换。曾经深入土著民族居住区的格拉韦搜集到一些交易情况的数据:1张黑貂皮价格是15~50卢布。俄国商人出售给土著居民商品价格分别为:1支步枪100~150卢布,1发子弹将近1卢布,1瓶酒3~5卢布,1普特小米10~20卢布<sup>[11]38</sup>。

通过华商、俄商与远东土著居民交易对比看,

俄国商人出售给土著居民商品价格要高于华商,而俄商收购毛皮价格要低于华商。关于这点,阿穆尔河沿岸地区总督、农学家 H. A. 克留科夫(Крюков)曾评价道:关于华商剥削异族人的言论“或多或少”被“夸大”了,俄国毛皮商人在和异族人打交道时要比华人“坏许多”<sup>[10]84</sup>。

## 二、华、俄商人竞争情况

远东数量众多的华商的存在对俄国商人及其他国家商人构成了威胁,华商和俄商的竞争贯穿于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远东商业史的始终。那时华商在店铺或商行数量上占优势,但规模上华商要照俄国及欧洲商人逊色。以远东地区工商活动最为活跃的符拉迪沃斯托克市为例看一下华、俄商人竞争情况(见表2)。

表2 1909年、1910年符拉迪沃斯托克黄种人和白种人商铺数量、营业额比较

	1909				1910			
	店铺数量(座)		营业额(万卢布)		店铺数量(座)		营业额(万卢布)	
	黄种人店铺	白种人店铺	黄种人店铺	白种人店铺	黄种人店铺	白种人店铺	黄种人店铺	白种人店铺
日用小百货店	68	62	191.29	395.20	141	101	349.20	339.10
混合店铺	230	51	743.19	786.52	414	227	1 006.17	2 484.99
食品店	964	253	330.00	279.10	833	319	365.85	349.05
水果蔬菜店	272	12	6.37	91.90	351	23	58.15	4.40

资料来源: В. В. Граев. Китайцы, корейцы и японцы в Приамурье. // Труды командированной по Высочайшему повелению Амурской экспедиции.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тип. В. Ф. Киршбаума, 1912. Выпск XI. “Приложение № 7” с. 357-358.

1909年和1910年除了“日用小百货”,华人店铺数量普遍比俄国人的多,但总营业额相差无几,甚至数量较少的俄国商铺反超过店铺数量较多的华商的营业额,如“混合店铺”。1909年华人商铺数量是俄人的几倍,但总营业额却不如俄人店铺。1910年的情况也是如此。食品方面,1909和1910两年情况相同,华人店铺数量远多于俄国人的,但总营业额相差无几;水果蔬菜方面,1909年12座俄国店铺的营业额是272个华人店铺的十几倍。1910年情况较好,351个华人店铺的营业额高出23个俄国店铺十几倍。

此外,华人和俄国人获得从事工商业许可证的数量多少也能反映出他们经营规模的差异。那时俄国政府根据经营者纳税情况授予其相应等级的经营许可证书,有一等商人、二等商人、小商人等。高等级商人的资本一般要比低等级商人的雄

表2数据是以经商者的肤色来界定,冠之以“黄种人”和“白种人”。那时在远东地区的黄种人主要有中国人、朝鲜人和日本人,但三者从事领域有差别,朝鲜人活动的范围主要是农业、以黄金开采业为主的矿业领域,经商的很少。远东地区日本人数量远不能和中国人、朝鲜人相提并论,而且日本人活动的范围主要是沿海一带,从事的活动主要是海洋渔业。相对于朝鲜人、日本人,远东中国人从业领域很广泛,农业、工商业、采金业、运输业中都能看到大量中国身影,因而表2中列举的“黄种人”的主体是中国人。至于表2中所说经商的“白种人”主体是俄国人,那时远东商业领域有德国人、英国人等其他欧洲国家的商人,但数量有限,不能和俄国人相比。综上所述,表2列举的“黄种人”和“白种人”商铺和营业额数据能反映出当时华商和俄商经营情况。

厚,纳税额度要多些。19世纪末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华、俄商人获得经商许可证情况见表3。

表3显示,1890—1893年4年间没有一个华人获得一等商人证书,1890和1891年华高中二等商人的数量少于俄国及其他国家商人,但小商人、贩运商(развозная торговля)、挑贩(разносная торговля)的数量远多于俄国及其他国家商人,特别是贩运商和挑贩的数量具有压倒性优势,但华商在大买卖方面不占优势。十月革命前阿穆尔河沿岸地区规模较大的贸易主要集中在俄国商人或其他欧洲国家商人手中,其中较为出名的有秋林(Чурин)公司和德国的“库斯特—阿尔贝斯”(Кунст и Альберс)商行,在阿穆尔河沿岸地区几乎所有城市及大村庄都有这两家公司的分支机构。以上所谈是滨海省情况,下面看看阿穆尔省的情况(见表4)。

表 3 19 世纪末符拉迪沃斯托克参议会颁发的各类经商许可证数量 单位: 个

	1890		1891		1892		1893	
	华商	俄国及其他国家商人	华商	俄国及其他国家商人	华商	俄国及其他国家商人	华商	俄国及其他国家商人
一等商人	—	7	—	14	—	13	—	9
二等商人	133	151	141	178	211	205	139	115
小商人	83	58	110	56	117	55	100	87
渔猎商	24	20	31	16	35	24	33	25
贩运商	14	3	38	9	32	17	34	22
挑贩	138	12	117	5	216	6	301	6
总计	392	251	437	278	611	320	607	264

资料来源: A В Даттан.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очерк развития Приамурской торговли. Москва, 1897г. С. 77.

表 4 1910 年阿穆尔省不同等级商业机构的数量和营业额

	华人		俄国人		黄种人外的外国人	
	企业数量(座)	交易额(万卢布)	企业数量(座)	交易额(万卢布)	企业数量(座)	交易额(万卢布)
一等企业			11	270.0	2	120.0
二等企业	76	150.0	394	360.0	12	90.0
三等企业	248	120.0	618	300.0		
四等企业	5	0.1	162	25.0		
贩运企业	17		101			
挑贩	48		33			
享有特惠权的企业			81			
总计	394	270.1	1 400	955.0	14	210.0

资料来源: В. В. Граве. Китайцы, корейцы и японцы в Приамурье. //Труды командированной по Высочайшему повелению Амурской экспедиции. Санкт - Петербург : тип. В. Ф. Киршбаума, 1912. Выпск XI. "Приложение № 6" С. 356.

表 4 显示: 其一, 阿穆尔省的工商业活动不如滨海省活跃, 无论是俄国人的, 还是华人和其他欧洲国家人拥有的商铺数量都照滨海省逊色; 其二, 在滨海省华人占优势的挑贩、贩运贸易领域在阿穆尔省则失去优势; 其三, 规模较大的商业机构, 如一等、二等商人的商行同在滨海省一样, 在阿穆尔省华商的拥有量仍有限, 不如俄国商人。

符拉迪沃斯托克是阿穆尔河沿岸地区贸易中心, 聚集了各国的商人, 该地华、俄店铺数量对比情况: 1893 年, 当地有华人商铺 127 座, 俄国人商铺 23 座; 1909 年, 华人和俄国人开设的商铺分别是 447 座和 99 座; 1910 年华、俄商铺数量分别是 625 座和 181 座<sup>[10]79</sup>。至 1912 年, 华、俄商人拥有工商企业数量对比达到一个新值(见表 5)。

表 5 显示, 俄国人和其他欧洲人拥有的企业占当地全部企业的 43%, 华人企业占 47%, 全部黄种人企业加到一起占 57%。从企业员工所占比例来看, 华人企业员工数量占当地全部企业员工总数的 60.5%, 俄国及其他欧洲企业仅占 31.3%。但表 5 的数据是不完全的, 因为它没有涵盖挑贩和贩运商, 这两类销售形式几乎被华人垄断; 也不包括没有领取营业执照的企业, 因为

表 5 数据来源于阿穆尔地区税务局的资料, 仅记录纳税企业, 至于未纳税企业的情况就无从知晓了。不可否认的一个事实是, 那时无照经营的商人当中华人占有一定比例。若把挑贩和贩运商以及无照经营的商家计算进去, 华人企业及其员工数量所占比例会更大些。从以上数据能看出该市及滨海省, 乃至全阿穆尔河沿岸地区华商情况。

表 5 1912 年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企业及其员工数量

企业拥有者的国籍	企业数量	员工数量
俄国人和欧洲人	940	3 487
中国人	1 023	6 751
朝鲜人	27	446
日本人	192	462
总计	2 182	11 146

资料来源: Записки Приамурского отдела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Вып. II. 1913. Хабаровск. 1913. С. 274 - 275.

类似情况不仅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出现, 在阿穆尔河沿岸地区的其他城镇和居民点也出现了。尼科利斯克—乌苏里斯克从 1883 起部分俄国商铺就开始破产或关闭, 而与此相反的是华人店铺大量成立; 1893 年该地华人商铺为 69 个, 而在 10 年前那里没有 1 个华人商铺; 1909 年, 华人商铺

达到 245 个,俄国人商铺 48 个;1910 年华、俄商铺数量分别为 272 和 106 个<sup>[11]33</sup>。

### 三、结语

十月革命前,华人积极参与俄远东商业活动,成绩斐然,之所以如此是多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首先和华人的勤劳、经商才能有关系。关于这点,当时的俄国人是承认的。П. Ф. 翁特尔别格评价道:中国人是天生的商人,他们具有卓越的经商才能,只要哪里稍有机会可乘,他们就奔向那里去做各种各样的生意<sup>[2]189</sup>。《西伯利亚问题》杂志的编辑 П. 戈洛瓦切夫(Головачев)也给予华商很高评价:华人在经商天赋上和犹太人有共性……华商有进取心、爱劳动、精明、整洁、勇敢,而俄国商人懒惰和缺少经商的积极性。从这个角度出发,华商作为竞争对手是不可战胜的<sup>[10]66-67</sup>。

其次,和他们的经营方式、营销手段有关。华商在经营时多采取合伙制和网络化经营。中国商业机构多是些中小规模的商号或店铺,雇佣的员工数量有限,员工多是主人的亲属或同乡,年底他们参与利润分配。合伙制能调动员工劳动积极性,同时也降低了商行或店铺的经营成本。除了实行合伙制外,还实行网络化经营,即大商号和中小商号以信贷建立起密切的联系,大商行借款给中等规模商行,中等规模商行再借款给小商号,这样建立起一个商业网络。在这个网络中商行能以较低的价格卖出货物,资金能得到较快周转。

经营过程中,华商的运营成本要比俄国商人低很多。当时一个俄国商行的各项费用,如员工工资、住宿、奖金、租用货栈及照明、取暖等,约占整个营业额的 15%~20%。而一个同等规模的中国店铺,以上各项开支不会超过营业额的 5%~8%<sup>[11]30</sup>。之所以成本如此之低,和华人的吃苦耐劳精神及合伙制经营有关。中国店铺中雇佣的多是店主的亲属,因为参与分红,所以薪水微薄,一般每月只有几卢布,几乎等同于无偿劳动。中国人的吃苦耐劳精神在此也有体现,店员通常住在店铺里,吃的食物也很简单,吃饱即可。经营中不做广告,待卖的物品简单地摆放在货架上。曾到过远东的旅行家 Д. И. 施罗德对符拉迪沃斯托克华人商铺的陈设做过描述:在不大空间里平行地

摆放着一排排小型的木制“商场”……在里面可以“找到一切”,从皮货到肉再到便宜的五谷杂粮<sup>[6]</sup>。通过以上几种方式,华商的经营成本就降低了,出售商品的价格自然会低,在和俄国或欧洲商人竞争中占有价格优势。

[本文在引用 В. В. Граве 的“Китайцы, корейцы и японцы в Приамурье”一书资料时部分参阅了李春艳等译、张宗海校对的《阿穆尔沿岸地区的中国人》(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4年)一书的译文,在此注明并致谢。]

### 参考文献:

- [1]张宗海,张临北.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华商在俄国远东地区的形成和发展[J]. 俄罗斯学刊, 2015(2); 宁艳红. 浅析早期旅俄华商的经贸活动及其作用[J]. 西伯利亚研究, 2014(5).
- [2]翁特尔别格 П. Ф. 滨海省(1856—1898年)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0.
- [3]曹廷杰集: 上册[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125.
- [4]吉林省档案馆. 驻扎海参崴总领事官呈报该地及领辖各处华商大略情形[G]//宁艳红. 旅俄华侨史料汇编. 哈尔滨: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2016: 42.
- [5]张宗海,张临北.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华商在俄国远东地区的形成和发展[J]. 俄罗斯学刊, 2015(2).
- [6]聂丽·米兹, 德米特里·安洽. 中国人在海参崴——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历史篇章(1870—1938年) [M]. 胡昊, 等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
- [7]Романова Г. Н. Торговая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Китайцев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 России(Конец XIX – Начало XX в.) [J]. Россия и АТР, 2009(3).
- [8]Петров А. И. «Русский Китаец» Николай Иванович Тифонтай(Цзи Фэнтай) [J]. Россия и АТР, 2005(2).
- [9]Петров А. И. История Китайцев в России: 1856—1917 [M]. СПб: Береста, 2003.
- [10]Сорокина Т. Н. Хозяйственная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Китайских Подданных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 России и Политика Администрации Приамурского Края (Конец XIX – Начало XX вв.) [M]. Омск: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ОмГУ, 1999.
- [11]Граве В. В. Китайцы, Корейцы и Японцы в Приамурье [M]//Труды Командированной по Высочайшему Повелению Амурской Экспедиции. Санкт - Петербург: тип. В. Ф. Киришбаума, 1912. Выпск XI.

[责任编辑: 初 祥]